

全团院校统编教材

实用演讲学教程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吴广川 主编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演讲的起源和发展	(1)
第二节 演讲学发展的历史	(5)
第三节 演讲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	(20)
第二章 演讲的形式与特征	(28)
第一节 演讲的形式与类型	(28)
第二节 演讲的基本特征	(42)
第三节 演讲的基本要求	(48)
第三章 演讲稿的写作	(58)
第一节 演讲稿的特点及作用	(58)
第二节 演讲稿的基本结构	(64)
第三节 写作演讲稿的基本要求	(72)
第四章 演讲的技巧 (上)	(81)
第一节 演讲的口语技巧	(81)
第二节 态势语的表达技巧	(108)
第五章 演讲的技巧 (下)	(119)

第一节	临场演讲的技巧	(119)
第二节	不同形式演讲的技巧	(139)
第六章	演讲训练	(161)
第一节	口语训练	(161)
第二节	态势语的训练	(191)
第三节	演讲的心理训练	(200)
第七章	演讲前的准备	(211)
第一节	熟悉演讲的内容	(211)
第二节	了解、组织演讲环境 ...	(218)
第三节	选择表达方式	(224)
第四节	临场前的心理准备	(228)
第八章	演讲风格	(234)
第一节	演讲风格的含义	(234)
第二节	演讲风格的类型	(236)
第三节	演讲风格的形成	(240)
第九章	演讲者的修养	(243)
第一节	演讲者的品格修养	(243)
第二节	演讲者的理论修养	(250)
第三节	演讲者的知识修养	(255)
第四节	演讲者的心理修养	(260)

第五节	演讲者修养的途径	(270)
第十章	演讲活动的组织	(275)
第一节	开展演讲活动的意义 ...	(275)
第二节	演讲活动的组织	(278)
第三节	演讲的评判	(282)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演讲的起源和发展

演讲作为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是人类从蒙昧时期进入到文明时期后的产物。从西安半坡遗址构筑的议事室来推测，在六千年前的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就已经有了早期演讲活动的萌芽和雏形，只是由于缺少文字记载，我们尚无法了解当时演讲活动的具体情况。见诸于文字记载的演讲活动，是到了奴隶社会时期才有的。从我们现在所掌握的历史资料中可以看到，人类演讲活动的起源是伴随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步现象，是社会的生产、生活、政治、文化、教育、法律，以及人类的思维、语言发展的结果。对演讲的起源和发展，我们大体可以总结出这样一条规律，即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是演讲活动的起源和发展的基础，而演讲的产生和发展，又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演讲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二者互为因果。

一、生产实践是演讲产生的基础

生产实践是人类演讲活动产生的基础。劳动创造了人，也创造了人的语言，创造了语言的表达形式。原始人在共同劳动中，不断扩大征服自然的范围。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他们聚居在一起，共同劳动、互相帮助，团结得比猿群更加紧密和牢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逐渐感觉到有许多东西需要商量、交谈。比如，交流生产经验，传播生产技术，交换各

种产品，这一切都要借助于语言这种表达形式。在我国古代的传说中，就有燧人氏教民取火，神农氏教民种植庄稼，有巢氏教民造巢等等，他们都是用口头语言向下代传授生产经验，组织训练年轻人从事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可以说燧人氏、神农氏、有巢氏就是最早运用口语形式向人民传授生产技术的演说家。在这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技术的提高，产品的种类和数量的增加，生产方式的日益变革，人类语言的词汇量不断增加，语言表达的方式也不断改进完善。与此同时，在生产劳动过程中，人体的机能也在不断地演变进化，人的发声系统的功能也在不断地提高，以至可以随时随地发出任何富有意义的声音，也就是说可以运用各种各样的声音及其组合表达任何一种思想和感情，这些都为演讲的产生奠定了物质基础。正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的“生产的继续发展，阶级的出现，文字的出现，国家的产生，国家进行管理工作需要比较有条理的文书，商业的发展，商业更需要有条理的书信往来，印刷机的出现，出版物的发展——所有这一切都给语言的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变化。”^① 因此，人类演讲活动的产生不仅要以人的社会生产实践为前提，其发展水平也要与社会生产水平相适应，即社会生产发展到什么程度，人类的语言表达也就发展到什么程度。

二、人的思维能力的发展推动了演讲的发展

演讲产生，不仅标志着人类语言表达能力的飞跃，也标志着人的思维能力的飞跃。斯大林曾经说过：“在会说话的人那里，是不存在同语言材料有联系的赤裸裸的思想。”^② 思维

①②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是人类长期发展过程中所获得的一种能力，是人脑的特殊机能，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概括和抽象的一种高级阶段的意识活动。但人类的思维首先要借助于语言，人有了语言，才能发展思维。人类的思维过程，就是运用语言进行分析、推理、判断的过程，而语言的表达是人们把思维过程诉诸别人的听觉过程。另一方面，人类思维的不断发展，又促进了人类的发展。人的语言表达能力的发展，是人的思维能力发展的产物，人类如果没有对客观事物的高度的认识能力，没有一定的逻辑的辩证思维的能力，就不可能达到与之相适应的语言表达能力。因此，人类演讲活动的产生是人的思维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人的思维能力没有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不仅不能表达出一定的思想，而且对彼此表达出来的思想也不可能有深刻的理解和感觉，这就是人的语言表达能力与思维发展的特殊关系。

三、人类社会交往的需要是演讲发展的动力

“人的本质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人们生活在社会上，总是要有各种交往，要处理和协调各种人际关系，以维持人类社会的正常运转，而人们交往的重要手段之一便是人类的语言。人类的各种交往活动，无不直接或间接地以语言为工具，通过语言达到彼此了解，并以此调整 and 选择人们的交际方式和交际内容。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人们交际的范围，交际的内容和手段也随之发展，这样作为人类交际手段的语言表达形式也必然得到发展，演讲正是适应了人类的这种社会交往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

四、社会的政治斗争、学术争鸣为演讲的发展起了催化作用

人类社会自从有了阶级、国家以来，各阶级之间和国家之间的政治斗争一直持续不断，在这些斗争中，被称之为唇枪舌剑的演讲术便成了重要的武器。《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曾对语言在这些斗争中的作用进行过十分形象、生动的描述，他说：“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蔺相如廷叱秦王，完璧归赵；张仪说使楚怀王断齐以亲强秦，都是演讲在政治斗争中的生动写照。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都是闻名于世的思想家、哲学家、逻辑学家和演讲家。他们通过演讲发表政见，阐述观点，批驳论敌争取盟友。这些，在我国先秦诸子百家的典籍，如《左传》、《战国策》等书中都有丰富的记载。在当时，社会动荡，诸侯逐鹿，各种思潮蜂起云涌，各家各派争先建立自己的学说，宣传自己的主张，形成一个空前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正是这种时代的需要，使春秋战国时期的“说辩”之术，有了空前的发展，并出现了许多能言善辩之士。历史上的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大多都是出色的演讲家，社会的发展使演讲与政治斗争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演讲不仅是国家之间进行政治斗争的需要，也是统治阶级对内维持其统治地位的需要，它从来都被视为统治者管理国家，征服民众的重要工具。统治者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就必须掌握能够影响民众，并为民众所折服的演讲术。正是这种政治斗争的需要，促使社会上各阶级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乃至军事家都必须十分重视对演讲理论、内容和技巧的研究。翻开古今中外的历史，凡是社会思潮最为活跃，阶级斗争最为激烈、社会变革、政治更替最为频繁的时期，也是演讲的理论与实践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从这一点来看，阶级斗争、学术争鸣的确

为演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第二节 演讲学发展的历史

演讲和演讲学并不是同一的概念，演讲常指人们的演讲活动或称演讲实践。而演讲学是指人们对已有的演讲实践材料、教据、事实或问题的分析概括，从中找出的规律性的东西，并使之上升到理论而形成的学说。因此，演讲学的产生要比演讲的产生晚得多，因为演讲活动的许多内在规律，有赖于演讲实践的经验总结，没有这一点就不能产生演讲学。演讲学的产生和发展虽然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历程，但随着人类演讲实践的发展，演讲学作为反映人类语言表达规律的科学，还是得到了日趋成熟和完善，成为一株立于科学之林的参天大树。

一、中国演讲学的历史

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是一个很重视口语表达的国家，演讲术这一口语表达的重要成果在我国古代文化中曾大放异彩。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尚书》就是一部虞、夏、商、周的四朝文选。《尚书》二十八篇所包括的内容有典、谟、训、诰、誓等诸方面，其实都是演讲辞。《尚书》中的《甘誓》，就是记载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的第一代国王“启”，率领军队征讨一个叫“有扈氏”的部落时，到达“甘”地集结时，所发表的一通言论；《尚书》中的《汤誓》，是记载商汤王讨伐夏暴虐之君“桀”时，对他的部队所作的誓师演讲；《尚书》中的《牧誓》是记载周武王进攻商朝首都朝歌时，在一个叫“牧野”的地方向军队所作的战前誓言。从

这些历史文献的记载中可以证明，中国是演讲的最早发源地之一。

我国不仅有大量的关于演讲辞方面的记载，而且也涌现出一大批灿若群星般的演讲家。《尚书》中的《盘庚》，就是记载我国第一个演讲家盘庚的演讲辞。盘庚是商朝的明主，他迁都到殷地去时遭到了臣民的反对。为了贯彻自己的主张，盘庚对贵族和奴隶，先后发表了三次演讲。第一篇讲于迁都之前；第二篇讲于迁都之时；第三篇讲于迁都之后。从这三篇演讲辞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演讲家，他的演讲不仅内容丰富，而且运用了生动朴实的口语，表达形式极为形象、生动、鲜明，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这些足以证明，我国古代已经十分重视口语表达技巧的运用。但这一时期的演讲技术，从我国演讲发展的历史看，只是刚刚开始，还没有形成什么完整的谈说理论，更谈不上成为一门学问了。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奴隶制逐步向封建制度改变。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思想非常活跃，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侯国之间为了争霸的需要，除了兵戎相见之外，还展开了频繁的外交攻势，“行人”穿梭于侯国之间，因而外交辞令显得十分重要。而春秋战国时期，文字记载多以竹简为书，以昂贵的绢帛著述，经济和语言表达的工具尚不发达，这样口语就成了人们交流思想，从事社会活动的最好形式，这便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百家争鸣的“演说时代”。

演讲的活跃首先体现在诸子百家的学术争鸣和四方游说，宣传自己各自的主张方面。当时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就看到了口语表达的重要性，他曾说：“不学诗，无以言”“言以

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特别强调了语言表达的重要性，在他兴办的私学中把培养学生的表达才能列为教学的重要内容，“孔门四科”中的言语课，实际就是辞令课，亦即现在的演讲课或口语训练课。孔子不仅十分重视人的口语表达，而且也十分注重演说技巧的运用，《论语》中曾记载了这样一段话：“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里主要是阐述了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关系，认为内容如果超过形式就显得粗鄙了，形式如果超过内容就显得虚浮不实了，只有内容与形式配合得当，才堪称君子。孔子这里的“质”与“文”虽然是指儒家的“仁义”和表现形式“礼乐”的关系，但实际上是讲思想内容与其表达形式之间的关系。孔子不仅从大的方面阐述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还提出了一些口语表达的技巧问题，指出语言的表达要做到言之间有物、有序、有文采。他还提倡“辞达而已矣”，即主张言辞要通畅地表达思想感情。但他反对“巧言令色”，指出“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从而反映出他的言要务实，反对言过其实的语言观。

儒家学派的另一位语言大师是孟子。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某些语言观，主张“言近而皆远”（《孟子·尽心》），即言辞浅近而意义深远。孟子素以“好辩”、“善辩”著称，他的论辩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并能得心应“口”地使用各种各样的论辩术，说服和战胜对手。因此，他的论辩辞成为后人研究论辩演讲的主要语言资料。

荀子也是一个能言善辩的儒家人物，他主张言辞要遵守道德规范。《荀子·外相》篇上说：“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言，虽辩，君子不听”。又说：“口不出恶言”。他还

主张语言美，“言语之美，穆穆皇皇”。（《大略》）“穆穆”是敬重的样子，“皇皇”是文雅正派的意思。荀子还专门论述了谈话的原则和方法，认为人的口语表达要有严肃、郑重的态度，坚强的信心，要用比喻的方法来启发，用分析比较的方法让人明白，要热情和善地把自己要说的内容传达给对方。只有这样重视、珍惜和尊重自己所讲的东西，谈话就一定会被人们所接受。荀子的语言观对今天的演讲艺术仍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墨家的创始人墨子，也是一位能言善辩的人。他对“辩”有十分精辟的论述，所以《墨子》也叫“墨辩”。他曾提出论辩要“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其大意是语言要反映客观事物，要表达思想感情，要深入原故，揭示本质。他还指出“论求群言之比”，即语言要讲究各种表达法的比较，从中选择最好的表达方法。不仅如此，墨子还提出“或”，即表达上的或然判断，表示或许为此，存疑问，模糊一些；“假”，即假言判断，假设的修辞方法；“效”，即效法摹仿；“辟”，即譬喻、比拟、借代等；“侔”，即类比推理；“推”，即由已知推求未知的七种谈话语句的表达方法。

此外，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的韩非子在《说难》、《问辩》等各篇中，对演讲，论辩对象的心理、语言、语言运用方法和技巧等，也都做出了比较精辟的论述。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张仪，力主合纵抗秦的纵横家苏秦等，不仅是当时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中的风云人物，也是一些能言善辩的演讲人才。

春秋时期的演讲活动，不仅见诸于诸子百家的学术争鸣上，而更多地则表现在社会的政治斗争和侯国之间的争雄方

面。比如郑国的子产，就是一位在政治斗争中很善于辞令的人。当时的郑“国小而逼，族大宠多”（《左传》），子产为政后，在“安定国家”的同时，广泛地开展了外交活动，周旋于晋楚之间。他巧妙地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展开斗争，慎于辞令，使郑国在大国争霸的夹缝中得到以生存发展，并打击了大国的气焰。正所谓“子产有辞，诸侯赖之”（《左传》）。这样讲虽然有些夸张，但也确实反映出子产口语表达的才能。子产说辩技巧主要表现在他总是以理服人，善于审时度势，以柔克刚。他的外文辞令，成为后人研究演讲术的宝贵遗产。

春秋时期的另一个以语言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著名人物就是齐国的晏婴。晏婴是齐国的丞相，个子虽小，却长于辞令，能言善辩，他用犀利的口才，维护了高尚的人格和齐国的尊严。晏子的演讲特点，主要在于论辩，他的论辩是直与婉，庄与谐的对立统一。他善于根据对象，场合和内容不同，随机应变，灵活地驾驭语言，该直言陈说的时候，滔滔不绝，势不可挡；该委婉诉说的时候，又能循循善诱，若小桥流水，曲径通幽。因此，晏子不愧为一位善于驾驭语言的大师，他的口语表达技巧对后人演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翻开先秦的典籍，可以找到不少能说会道，出口成章的人，论战的曹刿，贺贫的叔向，观乐的吴子季扎，说赵太后的触龙，讽齐王纳谏的邹忌，谈帝王之术的商鞅，这些都是精于口语表达的语言大师。记载这一时期谈说之术的文章也很多，《论语》、《左传》、《战国策》、《国语》、《战国纵横家书》等等。其中，《左传》中的《曹刿论战》，《战国策》中的《邹忌讽齐王纳谏》、《触龙说赵太后》、《唐雎不辱君命》、《叔

向贺贫》、《赵威后问齐使》等等都闪耀着语言的光辉，反映出我国演讲术已发展到一个新水平。

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由于秦王朝逐渐重视上书秦陈，“说”的地位下降，“写”的地位上升，使演讲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缓慢和曲折的过程。今天我们所见到的秦汉以后的文字，也多为奏疏，很少看到有应对的记载。当时的士大夫也经常是钝于言而敏于文。这种风气，加上文言、白话分家以后又实行科举制度，口语应对的内容就较少记载下来。尽管如此，在我国近两千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由于政治斗争和社会生活的需要，秦以后的历代社会中都无不缺乏演讲人才和谈说艺术的材料。

西汉时期的经济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是我国秦以后演讲史上的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撰写的《说苑·善说》篇，专门总结了从春秋战国到秦汉以来的谈说艺术。《善说》篇虽然只有二十八则，却系统地对“谈说艺术”进行了总结和概括，阐明了研究和应用谈说之术的重要性，即“辞不可修，而说不可不善”，“夫辞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国、全性者也”，意思是说一个人言辞的当与否，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得失，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刘向的《善说》继承和发展了春秋至汉的各家有关谈说方面的理论，言简意赅，在实践上有高度的典型意义，在具体方法上，也总结出可以遵循的各种谈说之术，并揭示出其规律性，对我国演讲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对我国演讲学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另一位人物是南北朝时的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勰，他是我国第一个把演说和演说辞作为一门艺术科学来加研究，并建立了一套演说理论的人。刘

總在其重要的著作《文心雕龙·论说》篇中，科学地把演讲术归入“论体”艺术中，指出“详观论体，条流多品”，从内容上计有“陈政”、“释经”、“辩史”、“铨文”四种；从艺术形式上可分为“议”、“说”、“传”、“注”、“赞”、“评”、“序”、“引”八法。此外他还对演讲的意义，演讲的道德，演讲的技巧，以及演讲的风格等问题也都作出了重要的论述。他的这些理论对我国演讲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演讲在我国的发展，不仅可以从官方的政治斗争和名家的著述中找到资料，而且在宗教传播学术交流和达官贵人的清谈中也可以找到大量宝贵的资料。南北朝时期，佛教从印度传入我国以后教徒们宣传教义主要靠经师的咏经、歌赞和唱导师的演义式讲经的两种形式。经师讲经艰深难懂，而唱导师讲经中的内容，则多是一些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唱导师所唱的言辞，有的是临时口编的捷辩性的，也有的是早已写成稿本先后转承，备一般僧徒遵照演讲用的。但由于当时文化不普及，百姓中识文断字的人很少，加之佛教教义的深奥晦涩，要想让更多的人信奉，就要进一步讲究和改进宣传讲说的内容和技巧，即讲述的方式一是要通俗，二是要有情趣，以此吸引更多的听众。于是到了南朝末年，经师与唱导师的专业逐渐合流，通俗演讲形式开始出现并逐步得到发展，延至唐代，就形成了新的演讲经义的内容和形式，即佛教的变文俗讲，这便是中国古代宗教演说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古代演讲的另一种形式是书院的学术演讲。书院演讲形成于唐代，经宋、元、明、清的发展，使其日益兴盛，学术演讲也因此而繁荣起来。书院学术演讲同我古代的儒家和

佛家的禅林讲学关系渊源。自孔子而后以至汉魏，儒家盛行私人授徒讲学之风；魏晋以后佛教徒则每以山林名胜之地，建立禅林精舍，聚众讲学。书院学术讲学的形式也比较灵活，常是众多学者名流，升堂登坛，集会开讲，潜沉学问，自由发挥，随时举事，亦无定法。听者多至数十百人以至数千人，层次也很广泛，樵夫、陶匠、农工、商贾都可以来听。开讲时，台下衣冠森列，肃然无哗，时有感泣流涕者。可见，学术演讲在我国古代就已达到相当的规模，演讲的内容、形式、技巧也已发展到相当的水平，其中的许多精华也被后人借鉴并成为演讲理论的主要成份。

“清谈”也称“清言”，是我国古代演讲术的另一种重要形式。清谈起源于晋魏时期，所谓清谈，是指对于俗事之谈而言的。在当时，贵族名流相遇，不谈政理，不言民事，而专谈老庄，周易，并将此举视为高雅之事。清谈的主要方式是相互讨论争辩，各抒己见，摆观点，授理据。清谈有两人对谈，即所谓主客对话；也有一主多客或一客多主，不过主客双方都以一人为主，其余者可以插言；还有一种称为“自为主客”，即当别人对问题都无高见时，某人可以就此自己设疑，自己解答，以发表自己的高超见解。清谈和现代演讲的共同点是，要求讲的内容能标新立异。因此，清谈虽然有许多应该批判之处，但其语言之犀利，谈锋之锐削，逻辑之严谨，言理之雄辩，音韵之悦耳，对演讲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无可取之处。

总之，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尽管演讲学在我国的发展经历了一条异常曲折的道路，但各个朝代仍有一些人重视演讲理论的探讨和研究，如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汉代

的杨雄、王才，唐代的魏征、吕才，宋代的陈亮、叶适，明代的王夫之等，以及历代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李自成、洪秀全等，都曾是我国历史上比较出色的演讲家，他们的演讲名篇和演讲理论在我国演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到了近现代，随着民主革命的兴起，演讲出现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前后，演讲活动颇为活跃，一些革命烈士、爱国青年，登上讲台，走上街头，号召反帝反封建，鼓吹民主科学，宣传抗日，反对内战，出现了孙中山、蔡元培、陈天华、施洋、闻一多、鲁迅等著名的演讲家，他们充分利用演讲这个武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振兴大声疾呼，有力地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忱，振奋了民族精神，促进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我国的演讲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建国以来，我国党和政府的各级干部，在各种场合下进行过演讲或类似演讲的报告、讲话，这些对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特别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国内和国际的各种会议上，都做过生动、深刻、精彩的演讲或报告，其听众之广大，影响之深远，意义之重大，是我国演讲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然而，这种健康的发展趋势在文革期间遭到了破坏。在那动乱的年代里，演讲被当做大批判、打派仗，以至人身攻击的武器，遭到了严重的玷污，走上了歧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文革时期的诡辩之风，造谣攻击之风，被煞住了，演讲的荒芜冷落的局面结束了，一个群众性的有价值的演讲活动得到了恢复。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为阐述改革开放，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而进行了生动、深刻、精彩的